

从元瓷“靶杯”看基督教东传

施茜(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摘要] 本文阐述了公元四世纪之后高足杯的造型来源于基督教中圣杯,基督教的东传进程也使高足杯的流行呈现跌宕起伏的高峰和沉寂的低谷。文中同时论证了基督教东传至中国的时间应是在公元1世纪基督教创立伊始,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几乎相同。

[关键词] 高足杯;圣餐杯;基督教;金银器;陶瓷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1)04-0053-04

人们通常把元代出现的高足杯称为“靶杯”或者“马上杯”,认为是由于元蒙古族为了在马上端拿方便而制造的。高足杯在元代非常流行,分为深腹和浅腹两种。这种造型在隋、唐金银器中曾有出现,宋代几乎绝迹,但从元代开始,以陶瓷为材质的高足杯又广泛在生活中使用。可以明确地说,高足杯的造型是随着基督教的东传而在我国被逐渐接受的,它最初的样式来源于基督教的“圣杯”。

1. 神秘而神圣的圣杯——圣杯诞生的史实与传说

“圣杯”是基督教礼仪之一“圣餐”中的重要角色,仪式过程需要使用圣餐杯,杯中的红葡萄酒代表基督之血。Grail(圣杯)一词本来拼作grail,起源于古法语的gra(d)al,而gra(d)al则由中世纪拉丁语gradalis演变而来,意指某种餐具。对圣杯最传统的解释是在耶稣受难时,用来盛放耶稣鲜血的圣餐杯。圣杯的故事随基督教的发展起伏跌宕。

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基督教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那里的居民当时主要是犹太人,世代信仰着一种古老的犹太教。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父母都是犹太人。耶稣30岁时开始传教,犹太教祭司和

罗马地方当局对于基督一直非常警惕和不满,终以“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圣杯”的起源在亚瑟王版本中被描述为,罗马将官朗吉诺斯用长矛插入基督身侧,以确认他的死亡。当时,亚利马太的约瑟夫拿来基督在最后晚餐中用过的酒杯,承接流出的血液。这酒杯,一般被认为就是圣杯。

在公元312年之前,基督教一直被宣布为非法,受到种种迫害,直到公元330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公元306—337年在位)和李锡尼颁布《米兰敕令》,结束了迫害基督教的政策。并确定君士坦丁堡为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基督教才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基督教从此得以迅速发展,而由最初的民族宗教演变成为普世性宗教。自此,各地开始大规模地建造自己的教堂,举行《圣经》规定的种种仪式。各个教堂都拥有了自己的仪式用具圣餐杯,一般都是金质或银质的高脚杯,圣杯的造型逐渐被以一定的模式固定下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见过圣杯的真容,有一段时期,很多主教开始宣称自己拥有那些来自耶稣本人或著名使徒的圣物,于是也有不少教堂声称自己用来举行典礼的圣杯是当年收集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血的。据说圣大格列高利曾穷其毕生致力于寻找圣杯。他教导说这物件拥有伟大的力量,其中包括自我保护力量,其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一说法。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圣杯”造型最早出现于公元4世纪左右。在这之前,圣杯常被人说成一种类似丰饶角饰(常为盛满花果、谷物的羊角)的杯子。只要它出现在饭桌之上,每一位同桌的客人都会得到食物和酒水。有些学者认为圣杯的前身可能是凯尔特神话中冥界的神锅,最有可能被确认为圣杯前身的爱尔兰父亲神达格达的神锅,可以为所有的人提供食物,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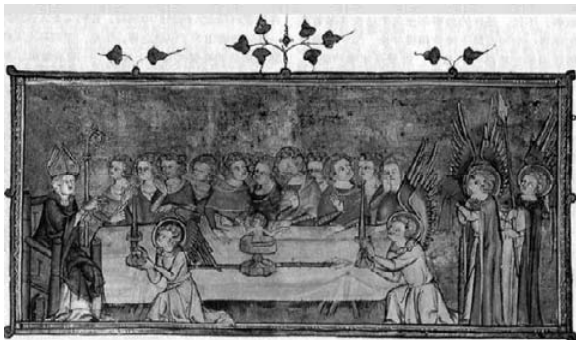


图1 亚利马太人约瑟与圣杯
1351年佛兰芒的一幅插画,表现的是耶稣基督在圣杯的帮助下得到复活,并且表现了约瑟正在带领第一任圣杯骑士做弥撒,同时到场的有《圣经》中说的两位天使长。

收稿日期:2011-05-30

作者简介:施茜(1972-),女,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苏州大学设计艺术学博士研究生,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史及美术考古。

2. 圣杯来到中华——典型的圣杯造型随基督教东传

圣杯造型在公元四世纪产生之后,随基督教东传进入中国。基督教是什么时候到达中国的,一直是一个待解之谜。公元一世纪前后,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公认时间,而创立于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国内一直被确定为唐代,在唐代被称为大秦景教,其确切可考的证据是,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明天启三年至五年(公元1623-1625)出土,上面刻有文字记载说,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欧洲基督教的聂斯托尔派派遣教士阿罗本(叙利亚人)等人来我国长安译经传教的事。三年后,该教士在长安建寺一所,称“波斯寺”,又称“大秦寺”(中国古代指罗马为“大秦”)。但是,传说中的基督教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到达中国,也就是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创教伊始。这一说法最早来自印度马拉巴尔教会的文献,其中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圣多默曾于公元一世纪来华传教。有“远东开教之元勋”之称的传教士沙勿略,1546年5月10日写的一封信中重述马拉巴尔教会的传说:“圣多默到过中国,并有不少中国人信教”^[1]。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士克路士在《中国志》中更加具体地描述说“使徒(多默)在摩列波尔(Moleapor,即马拉巴尔)殉教前,曾赴中国传播福音,居留若干天后,觉得他不能在那里作出什么来,就返回摩列波尔,留下那里收的三、四名弟子。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 1608—1658)于公元1613年来华,在中国传教和主持教务陆续达22年,他在1642年出版的葡文版《大中国志》中,引用了一份叙利亚文的每日祈祷书:“印度偶像崇拜的谬误是由圣多默扫除的。中国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由圣多默感化而皈依真理的。从圣多默那里,他们领受洗礼而成为上帝收养的子女。通过圣多默,他们信仰并信奉圣父、圣子和圣灵。通过圣多默,他们保持了他们从圣多默那里所得来的唯一上帝的信仰。通过圣多默,赐给生命的信仰荣光在全印度蓬勃发展。通过圣多默,天国展翅飞到中国人那里”^[2]。尽管没有足够有力的历史遗存证明在公元一世纪基督信徒已经踏上了中国的疆土,但是这些史料的记载不会是空穴来风。

中国与西部陆路上的往来,我们通常认为最早是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张骞出使西域,我们常赞叹他开辟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自此打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天然屏障。而实际上,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民间的力量永远超过官方。劳斐Laufer在《中国伊朗篇》(汉译本,364-365页)中告诉我们:“当张骞在公元前128年

到了大夏(巴克特里亚)的时候,他很惊讶看见那里已经有‘耶竹杖’和‘蜀布’,……当这位中国使节询问大夏人他们怎么得到中国产品时,他们回答说是在印度购买来的。因此张骞就断定印度离四川一定不会太远。后来这个地理观念引导中国人发现了云南。……古代有一条通商路线由四川经过云南,到达印度的东北部,又因为印度的西北边疆和伊朗的领土相接连,中国的商品就这样得以到达伊朗。”由此可见,中国与欧洲大陆的交往可能很早就已经开始,只要传教士有决心和毅力,公元一世纪和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和圣杯分别来到中国都是具有必然性的。

在自然条件不能构成对基督教东传障碍的情况下,众所周知,基督教自身也是一个热衷于传教的宗教,传教士积极向世界非基督教地区传教,被称为一个传教的宗教。《圣经》中说,由于耶稣基督能够给人治病、行各种奇迹,在他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门徒,其中最著名的有12位(其中包括圣多默)。这些门徒都认为耶稣就是犹太人长期以来热切盼望的弥赛亚,是犹太教的古代先知复活。同时,《圣经》说,耶稣基督死后七日复活了,并吩咐他的12位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凡受造的宣福音”^[3]。



图2 传说中的圣杯复制品



图3 陕西西安城郊隋李静训墓高足杯



图4 唐代狩猎纹高足银杯
陕西西安市沙坡村窑出土



图5 元代琉璃釉高足杯
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藏



图6 明成化窑
青花斗彩葡萄高足杯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基督教在初期仅在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地区传扬，随着其地位的确立，其教义和希腊哲学的结合，神学思想不断完善，基督教徒的层次从外邦犹太人和下层民众、普通士兵，上升到官吏、贵族甚至皇室成员。基督教本身也由最初的民族宗教演变成为普世性宗教。基督教认为其信仰超越于一切民族及其所信仰的宗教之上，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因此基督徒负有向天下的人们传播福音的天职。

基督教在四世纪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仪式和仪式用具。如果说，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到达中国具有可能性，那么，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传教到中国这一可能性，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条件就已成为必然。此后，基督教的标志性器物，十字架和圣杯开始在中国出现。山西大同南郊出土的北魏（公元386-534年）高足杯基本具备圣杯的特点，随后，西安城郊隋代的李静训墓（公元608年隋大业四年）、西安南郊隋丰宁公主墓出土高足杯，陕西西安市沙坡村窑出土唐代狩猎纹高足银杯等。

由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一直不像佛教一样一帆风顺，信徒主要是来自西亚和中亚各民族，传教士也都来自于域外，相信基督教的汉族人一直很少，因此，圣杯造型早期更多的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而且以金银器为主，器物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

3. 风靡之后的沉寂——唐武宗灭佛后的衰退

圣杯造型在唐代开始风靡，这个时期出土的和从域外传来的金银高足器最多，造型也最典型，分为直接从域外流入和模仿域外风格本土制造两种形式。高足器物应是伴随着基督教来到中国，并逐渐成为流行于上层社会的器物造型。前面提到的基督教的聂斯托尔派（唐称“大秦景教”）东传，“始自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亚历山大城教会安都城教会势力的争夺中，聂斯托尔惨败，被基督教法规与罗马帝国法律判为异端以后。聂斯托尔残党从罗马帝国领土最后之根据地以弗所流放，进入波斯领土，得到波斯皇帝卑路斯的保护，于498年前后成立一个独立基督教会”^{[4]39} 因此，景教“从叙利亚传入波斯、阿拉伯、印度，更由波斯东传中国”^{[4]58}

在唐代，景教徒经过努力，最终赢得了大唐皇帝的喜爱与信任。据景教碑载，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大秦国（波斯）有大德阿罗本携带经书来到长安，宰相房玄龄奉旨到西郊迎接，蒙唐太宗召见，并获准在宫廷中翻译景教经书，公元638年，太宗认为阿罗本所携经书：“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宣行天下。”遂召准京师义宁坊建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改“大秦寺”。高宗奉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肃宗在灵武诸郡建立景教教堂，堂中悬挂皇帝像；玄宗让其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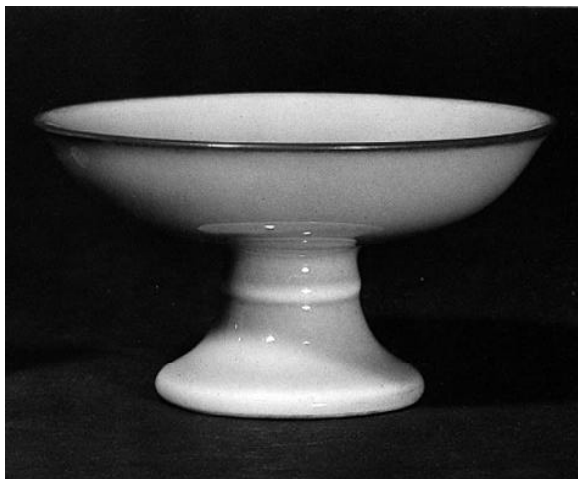


图7 清嘉庆汝釉盘 楨本堂制 陈昌蔚先生藏

五人到教堂行礼，复命高力士将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位皇帝像安置在教堂里面。同时景教徒也非常忠实于唐朝皇帝，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发生了安史之乱，郭子仪在河北打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联合回纥，收复长安、洛阳。他手下有一位得力干将，名伊斯，即为景教徒。因武功卓著，唐肃宗封伊斯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赐紫衣袈裟。从公元635年阿罗本进京到公元718年立景教碑的将近15年间，景教得到了充分发展，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家”的盛况，与祆教和摩尼教并称为唐代“三夷教”。^[5]

可惜好景不长，公元845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毁灭佛法”的会昌法难。会昌法难主要是针对佛教的，但是波及景教、摩尼教和祆教。《旧唐书》（卷18）载：“会昌五年夏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大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千。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竺佛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5]

景教在唐代流行时间长达210年，这是景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以后便在中国地区迅速衰落下去。景教繁荣带来的是圣杯造型在唐代得到珍视，随着唐代高足杯的大量出土，我们逐渐可以重构景教当年的繁荣景象。但是，在唐武宗灭佛之后，高足造型在中原迅速消失，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宋代这种造型流行的证据，此时景教已被驱逐出中原地区。但是他们一直在中亚和中国边疆如新疆及蒙古地区活动，因此在辽金时期，这种造型的金银器甚至陶瓷器也只有少量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元代，才开始有所改观。

4. 再度兴盛后的转变——圣杯在元代以后的世俗化过程

蒙古在1233年与宋朝军队合力消灭了统治北方

的金朝之后,即向西推进,所向披靡的蒙古族铁骑曾横扫亚欧大陆,入侵波兰与匈牙利,在第三次大规模西征中,蒙哥的同母弟旭烈兀攻破叙利亚的阿勒波,“大屠杀继续了一个星期,海顿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大礼拜寺,而基督教堂则受到保护”^[6]。

元朝建立之后,大量中亚民族内迁,景教(元朝也称也里可温教)卷土重来,成为强有势力的宗教,在很长一段时期,信徒可以不纳赋税、不服兵役。景教寺在当时因饰有十字架而被称为十字寺,据记载在山西大同,甘肃沙州(今名敦煌)、肃州、甘州、额里折(即凉州)、鄯州(即今西宁)、额里合牙(即今宁夏),新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赤斤塔拉思、伊犁以及东北三省等地区都有基督教徒和十字寺多处,在《马哥波罗游记》《元典章》中同样记载了在江苏扬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州,福建泉州以至于云南等地都有聂派基督教徒及多所十字寺的存在,根据《至顺镇江志》说,镇江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斯在任期间(1278—1282)在镇江建有六所景教寺,又载,当时镇江有景教徒23户,250人。甚至连成吉思汗本人及家族中都有多人信仰基督教,聂派基督教在当时的繁荣可见一斑。

我们现在看见元青花、元卵白釉的瓷器中有许多高足杯的造型,这在许多论著中被称为“马上杯”、“靶杯”的造型,其特征模仿了圣杯,元代高足杯大量使用廉价的陶瓷模仿金银器,这是圣杯造型在中国世俗化的开端。1980年江西高安出土窖藏元青花中有一件高足杯内底写有“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说明高足杯的用途为酒杯。尽管作为饮酒器,高足杯高贵的身份始终如一,常

常被用于重要的宴乐场合。元以后,陶瓷高足碗和高足杯,开始真正成为日常生活饮食用具。

天主教也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明王朝时,天主教传教士历尽艰辛、前仆后继,如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为了便于推行教道,处处迎合中国固有风俗习惯,他最初为接近中国人将自己扮成佛家弟子,后来知道儒家思想更受社会重视,改为着儒者的服饰。利玛窦以为凡不妨碍基督教本身信仰的各种习惯,不妨予以迁就。这样的努力使许多中国人逐渐接受了基督教,但这个过程也是圣杯从神圣走向世俗的动因。明代的陶瓷高足造型,逐渐创造出具有中国人文精神的柔和而流畅的曲线造型,这种造型在欧洲同时期的陶瓷生活用品中很少见。中国化的高足杯被广泛使用于生活中和寺庙的祭祀中,它的最初来源和功能似乎已经被埋没在历史喧嚣的尘烟中,然而它却能出现在我们今天宴会的餐桌上。

参考文献:

- [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8:59.
- [2]曾德昭.大中国志[M].何高济,译.李申,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87-188.
- [3]马可福音[M].16:15.
- [4]朱谦之.中国景教[M].东方出版社,1993.
- [5]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9.
- [6]托马斯·F·马太.拜占庭艺术—从古代到文艺复兴[M].卢峭梅,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梁田)